

“唐宋派”当称为“本色派”考辨

张慧琼

摘要:“唐宋派”是现行文学史标称的一个明代作家流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主要成员。此种观点自1947年被郭绍虞正式提出后,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对明清相关文献进行考证、辨析可以发现,明代文学史上确实存在一个以“王、唐、茅、归”为核心成员的文学流派,然以“唐宋派”名之欠妥。原因有三:一是推崇唐宋文是明前中期一种普遍现象,“王、唐、茅、归”仅是其中持论者;二是“王、唐、茅、归”不仅推崇唐宋文,同时也推崇其他时代符合他们审美标准的散文;三是“王、唐、茅、归”推崇散文的标准不是以时代论,而是以是否符合他们所倡导的“本色论”而定。深入辨析考察“王、唐、茅、归”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可知他们交往密切,同声应气反对“前七子”文学拟古主义,共倡“本色论”文艺观,故将他们称为“本色派”更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关键词:唐宋派;争议;考辨;本色派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11-0154-08

现行多种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都提到一个明代文学流派——“唐宋派”,并将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列为其主要成员。20世纪以来,这种论断几成定论。然近年学界许多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围绕“唐宋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质疑,形成一个仍在争议的学术公案。本文拟对所谓的“唐宋派”进行考辨,试图廓清迷雾,还原真貌,以正学史。

一、“唐宋派”称名由来

明清文献论及明代中期文学时未见“唐宋派”之名,但有大量文献将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四人中的两人或三人乃至四人并称。具体情况有5种:一是王慎中、唐顺之并称。明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文》云:“今之文章,如晋江、毗陵^①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1]明王世贞《与陆浚明先生书》云:“某所知者,海内王参政、唐太史二君子,号称巨

擘。”^②明王世懋《贺天目徐大夫子与转左方伯序》云:“于鳞辈当嘉靖时,海内稍驰骛于晋江、毗陵之文。”^③《明史·王慎中传》云:“慎中为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与顺之齐名,天下称之曰王、唐,又曰晋江、昆陵。”^[2]二是王慎中、归有光并称。明朱鹤龄《传家质言》云:“弇州、于鳞亦学秦、汉者也,而所诣何如王道思、归熙甫?”^[3]三是唐顺之、归有光并称。明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云:“一时文人望之不见其崖际者,武进唐荆川是也;文词虽不甚奥古,然自辟户牖,亦能言所欲言者,昆山归震川是也。”^[4]明艾南英《李龙溪近艺传》云:“当国初时,制举一道尚属草昧……震川、荆川始合古今之文而兼有之,然未及于国也。”^④《四库全书总目·白华楼藏稿提要》云:“坤刻意摹司马迁、欧阳修之文,喜跌宕激射。……而古文之品终不能与唐顺之、归有光诸人抗颜而行也。”清储大文《答曹谔庭》云:“唐应德辞气跃露,体虽三变,终是有震曜功名景象在。

收稿日期:2023-04-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顺之全集》整理与研究”(21BZW017);2022年阜阳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唐顺之八股文集整理”(2022KYQD0002)。

作者简介:张慧琼,女,文学博士,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阜阳 236037)。

归熙甫荟萃册子渊粹语,尚黜心解。”^⑤四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并称。明王世贞《颜廷愉》云:“愿足下多读《战国策》、史、汉、韩、欧诸大家文,意不必过抨。王道思、唐应德、归熙甫旗鼓在手,即败军之将,僭群之马,皆我役也。”^⑥明艾南英《与陈人中论文书》云:“当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遵岩三君子。”^[5]清黄宗羲《郑禹梅刻稿序》云:“当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与震川起而治之,则古文之道几绝。”^[6]清陈廷敬《翰林编修汪钝翁墓志铭》云:“尝慨然念前明隆、万以后古文道丧,沿溯宋元以上唐韩、柳宋欧、苏,迄明之唐应德、王道思、归熙甫诸家,盖追宗正派而廓清其夹杂不醇者,卓然思起百数十年文运之衰,此先生之志也。”^⑦清董正位《归震川先生全集序》云:“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嘉靖中,有唐荆川、王遵岩、归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7]五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并称。清蔡世远《书李杲堂集后》云:“明初诸家……王、茅、二川相继作,卒不能掩北地而上之。”^⑧清周亮工《南昌先生四部稿序》云:“前代名贤起而推挽之,势渐蕴隆,……然迹其所为碑、表、志、序、诗、传、铭、赞、古体,与应德、遵岩、鹿门、震川诸先生相契量。”^⑨

由上可知,在论及明代古文时,明清人均看到了王、唐、茅、归等人古文创作文体、文风的趋同性,不约而同地将他们并称,然尚无明确的流派意识,更没有以“唐宋派”呼之。“唐宋派”称名最早见于近代学者夏崇璞 1922 年发表于《学衡》杂志第 9 期的《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文派之潮流》一文,其后 20 世纪早期的几种文学史,如郑振铎完成于 1932 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钱基博 1934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明代文学》、陈柱 1936 年写就的《中国散文史》、朱东润作于 1943 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出版于 1949 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俱沿袭了明清人将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四人并称同论的做法,然均未使用“唐宋派”这一名称。1947 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述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的文论时,明确运用了“唐宋派”这一概念,将“王、唐、归”定为主要成员,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同。1949 年至目前的十几种文学史俱以“唐宋派”指称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主要成员的作家派别。

以上文学史对“唐宋派”的表述,持论的根据不外乎这样几个要点:一是“王、唐、茅、归”诸人反对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义,自

觉提倡唐宋文;二是“王、唐”深入阐述了文学主张,唐顺之《文编》选编八家唐宋文;三是茅坤在《文编》基础上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四是归有光散文文从字顺,平淡自然,颇有唐宋八大家之风。若对这些理由加以仔细辨析,便会发现这些根据俱不足以支撑“唐宋派”之论。近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唐宋派”进行质疑,引发了争议。

二、有关“唐宋派”的争议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关“唐宋派”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陈建华认为:

世称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唐宋派”,严格地说,倡始者王、唐乃是宗宋派。……至于归有光,同他们无直接联系。董其昌评他的古文:“前非李、何,后非晋江、毗陵,卓然自为一家之书。”归有光也反模拟之弊,但出发点与王、唐不尽一致。其思想与创作自成一家。所以,不应当把他与唐宋派一概论之。^[8]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云:

所谓“唐宋派”是指对嘉靖间文坛颇有影响的、以反拔李、何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该派作家主要从事散文创作。一般把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都列入“唐宋派”,其实是很含混的说法。严格说来,所谓“唐宋派”的主脑人物王慎中和唐顺之,实际上是宗宋派——说得更清楚些,是道学派,因为他们真正推崇的,首先是宋代理学而不是文学。唐氏说:“三代以下文,莫如南丰;三代以下诗,未有如康节者。”(《与王遵岩参政》)王氏也说:“由西汉而下,(文章)莫盛于有宋庆历、嘉祐之间,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曾南丰文粹序》)曾巩之文,邵雍之诗,即使在宋人中,文学气息也最为淡薄。所以,这里虽在论诗说文,评价的基准却是道学。茅坤在理论上附和唐、王,但不那么极端,态度常有些游移,他的“文人”气也比较重些;在散文方面,他以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著称,也是以唐宋并举。正如宋代理学家指责韩愈所言“道”驳杂不纯,宗宋与唐宋并举是有区别的。但在崇道的基本意义上,固不妨将唐、王、茅诸人合称为“唐宋派”。

至于归有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同唐、

王等人既无直接联系,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亦与之存在歧异,所以董其昌评他的古文“前非李、何,后非晋江(王慎中)、毗陵(唐顺之),卓然自为一家之书”(《凤凰山房稿序》)。把他从“唐宋派”中分离出来,似更为妥当。^[9]

廖可斌撰文《唐宋派与阳明心学》云:

唐宋派的真实面目,包括它兴起和盛行的原因、内部构成和发展过程、主导倾向及创作得失等,至今还掩映在一层薄雾般的帷幔之中,明代文学思潮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因此显得模糊不清。我认为,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圆满回答,必须对唐宋派与阳明心学的关系、唐宋派与嘉靖年间八股文风尚的关系、唐宋派与严嵩及嘉靖中后期朝廷党争的关系、归有光与唐宋派的关系等进行全面研究。^[10]

黄毅撰文《归有光是唐宋派作家吗?》云:

在历来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中,以及在其它一些研究明代文学的著作中,在谈及归有光时,都毫无例外地将他和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四人一起归入“唐宋派”,把他看作是唐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但是,倘若对唐宋派四大家,尤其是归有光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作深入地考察和分析,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归有光能称为是唐宋派的代表作家吗?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应该起码具有以下特点,即其成员之间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具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和文学观念,以及相近的创作风格。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来论述归有光并不能称作是一位“唐宋派”的代表作家。^[11]

张梦新《茅坤研究》云:

通常,人们往往因为七子推崇秦汉古文而称七子为“秦汉派”;而许多人由此认为“唐宋派”则唯唐宋古文是崇,甚至一些通行的古代文学史和教材也都这样认为。比如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因他们更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所以被称为‘唐宋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四册P138)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说唐宋派“都以散文见长,反对‘文必秦汉’的论点,提倡唐宋古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P913)。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至少是论述片面。^{[12]53-54}

贝京《归有光研究》第二章《归有光与唐宋派关系辨析》第二节《唐宋派命名的缺失》论述了唐宋派

命名的表象化及偏颇性,认为唐宋派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其命名理由不够严密充分,派别成员构成也含混不清^{[13]25-29}。何天杰《归有光非唐宋派考论》一文继黄毅之后,对唐宋派的主要构成问题再作探讨,认为归有光并非唐宋派成员^[14]。

归纳以上诸家观点,他们对“唐宋派”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以“唐宋派”命名王慎中、唐顺之等人组成的作家流派是否合理,二是归有光是否属于该作家流派。本文将以上述争议作为参照,拟对以王慎中、唐顺之等人为主要成员的作家流派进行考辨,还原其真貌。

三、“唐宋派”称名不能成立

明清人各自具体根据不同的标准并称“王、唐、茅、归”中的部分成员,近代学者则趋向于将四人放在一起讨论,看来古人与今人都意识到他们具有一定的共性。全面客观考察明代中期文坛状况及“王、唐、茅、归”等人的文学活动,可以发现确实存在一个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为核心成员的作家派别,归有光也应当属于这个派别,然以“唐宋派”名之欠妥当,有以全代偏、以偏概全、以表象代本质之嫌。

1. 以全代偏

推尊唐宋文尤其是唐宋八家文是自南宋以来就有的传统,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云:“嘉靖间,继承南宋以来推尊韩、柳、欧、曾、王、苏古文的既成传统……”^[15]明代推崇唐宋古文也并非始自“王、唐、茅、归”等人,而是自明初文坛对于唐宋文即倍加称赏。

明太祖朱元璋称赞欧、苏文章云:“朕阅宋书,见尚文之美,崇儒之道廓焉。……今特仿宋制,以诸殿阁之名,礼今之儒。必欲近侍之有补,民同宋乐,文并欧、苏。”^⑩明太祖的提倡对文坛崇尚唐宋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初众多馆阁文臣文宗唐宋。黄佐《翰林记》卷十九《文体三变》云:“国初刘基、宋濂在馆阁,文字以韩、柳、欧、苏为宗,与方希直皆称名家。永乐中,杨士奇独宗欧阳修,而气焰或不及,一时翕然从之。至于李东阳、程敏政为盛。”^⑪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赞扬韩、欧、曾、王之文继承周秦文以载道的传统,尤为推崇韩、欧:“世之论文有二,曰载道,曰纪事。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虽然,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此近代唐子西之论,而

予之所见,则有异于此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无荆榛之塞,无蛇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⑫宋濂亦称赏宋文,尤为推崇“三苏”,认为“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之文莫盛于苏氏。若文公之变化傀伟,文忠公之雄迈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杰,载籍以来,不可多遇”^⑬。宋濂门生方孝孺最喜苏轼,其所撰《苏太史文集序》云:“庄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为文者,宋之苏子而已。苏子之于文,犹李白之于诗也,皆至于神者也。”^⑭

洪武丙辰九年(1376年),朱右编辑唐宋《六先生文集》,又名《唐宋六家文衡》,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实为八先生文集。该书远早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但今已不传,唯坤此集为世所传。朱右对韩、柳、欧、曾诸家推崇备至,《新编六先生文集序》赞曰:“六先生之文,备三才之道,适万汇之宜,彝伦之懿,鬼神之情,性命之奥。……唐称韩、柳,宋称欧、曾、王、苏,六先生之文断断乎足为世准绳。”^⑮明人贝琼为朱右《六先生文集》作序《唐宋六家文衡序》,亦极力称赏唐宋韩、欧诸家之文:“盖韩之奇,柳之峻,欧阳之粹,曾之严,王之洁,苏之博,各有其体,以成一家之言,固有不可至者,亦不可不求其至也。”^⑯杨荣《欧阳文忠公祠堂重创记》云:“汉自贾、董、马、班诸子以来,七百余年而唐有韩子,又二百年而宋有欧阳子,其文推韩子以达于孔、孟,一洗唐末五季之陋。当时学者翕然宗之,及今四百年而读其文者,如仰丽天之星斗,莫不为之起敬。”^⑰姚夔《刘文介公文集序》云:“古今文章家,无虑数十百,求其有俾于道而不为空言者,汉董仲舒、贾谊、司马子长,唐韩退之、宋欧阳永叔数人而已。”^⑱解缙《送刘孝章归庐陵序》云:“余少时,先君子教以书……及教以为文,辄举黄文献公、欧阳文公之说,而溯其源于曾、王、欧、苏、柳、韩、班、马、董、贾、先秦以上,极于六经之奥,未尝自为臆说也。”^⑲

综上所述,推崇唐宋文在明代前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至弘治末年,李梦阳、何景明辈倡导“文必秦汉”,文体才稍变。至嘉靖年间,复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重倡唐宋散文创作风格。由此看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只是明代推崇唐宋文众多人中的几位,为何以全代偏独以“唐宋派”称名以他们为主的作家派别,而不称名其他推崇唐宋文的作家群体呢?“唐宋派”之称并不能令他们独特卓立以区别于明代前期其他作家,“唐宋派”这一命名并没有标立出一个作家流派的意义。

2. 以偏概全

“王、唐、茅、归”等人在推崇唐宋古文的同时,亦推崇其他时代的优秀古文。唐顺之编选《文编》六十四卷,自周迄宋历代都有文章入选,并没有刻意突出唐宋文的地位。此外,唐顺之曾编辑《左编》《右编》《文编》《武编》《儒编》《稗编》《诗编》等选本,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并不偏重于唐宋文。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此举是持“唐宋派”论者常持的根据。但是,茅坤除了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外,还编选了《史记钞》《汉书钞》《五代史钞》《明名臣经济文钞》等^{[12]42-50},《唐宋八大家文钞》不过是茅坤编选的一系列选本中的一种。何况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亦非始于茅坤,明初朱右已辑《六先生文集》。而《唐宋八大家文钞》盛行海内乡里,此并非编者作为,而是读者接受行为,此状况正好说明唐宋文在明代有着广泛的接受基础,不只是王、唐、茅、归几个人喜好唐宋文。

王慎中、茅坤还看到了韩、欧等唐宋文章之源其实在先秦、两汉诸家。王慎中《寄道原弟书九》云:“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领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⑳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引》云:“魏晋以后,宋、齐、梁、陈,迄于隋、唐之际,孔子六艺之遗,不绝如带矣。昌黎韩退之崛起德、宪之间,溯孟轲、荀卿、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㉑《唐宋八大家文钞·柳州文钞引》云:“昌黎之文得诸古六艺及孟轲、扬雄者为多;而柳州柳州则间出乎《国语》及《左氏春秋》诸家矣。”^㉒

而归有光喜好太史公文,至于其散文成就,文从字顺、情感真实、风格自然,这是中国自先秦两汉以来就有的散文创作传统,不独唐宋大家散文名家才有此成就。既然“王、唐、茅、归”不仅仅钟情于唐宋文,他们还称赏其他时代的文章而全面继承并博采众家之长,推崇唐宋文只是其全部文学主张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何以偏概全地冠以他们“唐宋派”之名,而不是“先秦派”“两汉派”“五代派”等诸如此类的名称呢?仅以唐顺之《文编》编选唐宋八大家文、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归有光的散文成就等为理由,来称名他们为“唐宋派”,实为勉强。

“王、唐、茅、归”等人确有推崇唐宋文的倾向,然而,他们只是明代推举唐宋文大趋势中的一小股力量,推崇唐宋文也只是其文学主张的一小部分。研究者不能只突出强调这一点而无视其他,以全代偏、以偏概全地称他们为“唐宋派”,皆难以成立。

3. 以表象代本质

持“唐宋派”论者只关注“王、唐、茅、归”等人推崇唐宋文这一现象,而没有深究此现象背后的本质。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一文提出“本色论”,并以此为准的高度评价晋陶渊明的诗:“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来,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他盛赞先秦儒、庄、纵横、名、墨、阴阳诸子文“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这样批判唐宋文中无“本色”者:

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然则秦汉而上,虽其老、墨、名、法杂家之说而犹传,今诸子之书是也。唐宋而下,虽其一切语性命谈治道之说而亦不传,欧阳永叔所见唐四库书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②3}

唐顺之《答王遵岩参政》推许曾巩文、邵雍诗,亦称赞寒山、陶渊明。可见,他尊推学习的对象不限于某朝某代,亦不限于某种文体,只要符合“本色论”的作品皆受其称赞。符合“本色论”的唐宋八家文得到激赏,不合此论的其他唐宋文则在批判之列。王慎中、茅坤、归有光俱有同于“本色论”的文艺观点。在推崇唐宋文的表象背后,“王、唐、茅、归”内在的趋同性是“本色论”的文艺观。他们在以“本色论”作为评价文艺作品优劣的标准方面形成共识,各自的创作不同程度地实践了“本色论”。唐宋八家文因为较其他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更符合本色论,他们的推崇意味才显得更浓重。近代学者因他们推崇唐宋八家文而名之“唐宋派”是一个表象化的误解,后来学者又不断强化这个误解,以致越来越突出他们文宗唐宋的倾向,而无视这一现象的本质。

“唐宋派”针对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文必秦汉”的文艺观被标立。李、何标举秦汉是复古,王、唐推崇唐宋亦是复古,以复古反复古,有何意义?然若究其实质,并非以复古反复古。贝京博士认为:“学唐宋只是王、唐等人相对于七子派的特点,而不是他们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实质。”^{[13]68}笔者亦持同论。王、唐等人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实质是“本色论”的文艺观。“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本是意在师法秦汉古人,结果走上模拟剽窃的文学拟古主义歧路。王、唐等人并非以学唐宋文来反对“前七子”,他们真正与文学拟古主

义针锋相对的是“本色论”的文学观念与实践“本色论”的文学创作。唐宋八家之文文从字顺,语言自然晓畅,符合“本色论”,相比佶屈聱牙的秦汉古文,这些作品易学好懂,故被拿来作为反对“前七子”文学拟古主义的具体文体武器。因此,以王、唐等人为基本成员的作家派别被称名为“唐宋派”欠妥。

四、“唐宋派”当称为“本色派”

笔者认为,界定一个作家派别时,该派应具备这样几个基本特点:成员之间交往密切,同声应气,相互影响;具有共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文学主张;创作风格大体一致或相近。根据这个界定标准,以王、唐等人为成员构成的作家派别可称为“本色派”。

1. 主要成员之间交往密切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文坛活跃着一批作家,著名者有“嘉靖八才子”(以王慎中、唐顺之最为著名)、茅坤、洪朝选、归有光等人,这批作家可称为“本色派”,王慎中、唐顺之、茅坤、洪朝选等人为核心成员。“本色派”核心成员交往紧密,唐顺之是“黏合剂”。茅坤、洪朝选、王慎中与其他“嘉靖八才子”成员等皆与唐顺之过从甚密。唐顺之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在京师初识王慎中^{②4},受其影响而文艺思想发生转变,此后二人终生往来不辍,相互引为知己。他们以书切磋文艺,以诗寄托友情,两人的诗文集载有彼此互赠的书札和诗作。嘉靖十四年(1535年)唐顺之告归,家居宜兴,此时王慎中谪判常州御史,两人时有文酒之会^{②5}。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唐顺之专程赴闽,委托王慎中为父有怀公撰写行状^{②6},其别集《唐荆川先生文集》的“序言”亦出自王慎中之手。王慎中交游甚广,然“于数人之中,吾所最敬惟毘陵唐荆川”^{②7}。

唐顺之是茅坤最折服之人,其文艺活动对茅坤影响极大。茅坤受唐顺之编撰《文编》的启发而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多次向他致书表述文艺观点。茅坤《白华楼藏稿》收有两篇《复唐荆川司谏书》,以此向唐顺之阐述文艺思想。唐顺之作有两篇《答茅鹿门知县》,其中具体透彻地阐述“本色论”文艺观,这是考察其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洪朝选向来没有得到学者重视,然就其与王、唐等人的交往及其文艺观与文学活动来看,他被列入“本色派”理所应当。《巡抚洪芳洲先生朝选》^{②8}载,嘉靖二十年(1541年),洪朝选就唐顺之讲学,后又师从王慎中,其文学、学术皆受二人影响。唐顺之寄

给洪朝选的信札收入《唐荆川先生文集》达八篇之多,多次阐发“本色论”。据唐顺之《与洪芳洲书一》^②,洪朝选有诗文问世即寄给唐顺之令其品评,唐顺之即以“本色论”的观点致以批评。王慎中与洪朝选为福建同乡,且有师徒之谊,两人过往非浅,王慎中《与李中溪书三》论其文学及为人时云:“吾乡有洪芳洲(洪朝选号芳洲)先生,文词直得韩、欧、曾、王家法,与唐荆川君最相知。其所作,视荆川不啻王深甫之于南丰,张文潜之于东坡,充其所极,当为本朝名家。今行年才踰三十耳,其文学如此。而其为人峻洁忠信,卓然有古独行之操,不以世俗之味镗发乱志,尤为荆川所敬……”^③

2. 共同反对文学拟古

“本色派”作家共同反对“前七子”倡导的文学拟古主义,声气相通,相互呼应。王慎中《与归善叶生》云:“近世俗弊,士无真识,古学不传,淫蛙塞耳。而仆独以孱力振雅调于群聋之间,宜其不为世所悦也。”^④唐顺之《与洪芳洲郎中》云:“所示济南生文字,黄口学语,未成其见,固然本无足论。但使吾兄为人所目摄,此亦丰干饶舌之过也。且崆峒强魂,尚尔依草附木,为崇世间,可发一笑耳。”^⑤

王慎中与唐顺之俱批评“前七子”为文剽窃古人而无真识己见。唐顺之指出,文章具有原创性的独到见解才能传之久远,翰惠后人,模拟剽窃古人之作即便刻版付梓,亦毫无价值,《答蔡可泉》云:“自古文人,虽其立脚浅浅,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灭,开口道得几句千古说不出的说话,是以能与世长久。……兄试观世间糊窗棂、塞瓶瓮,尘埃朽腐满墙壁间,何处不是近时人文集?有谁闲眼睛与之披阅?若此者,可谓之不朽否耶?本无精光,遂尔销歇,理固宜然。设使其人早知分量,将几块木板,留却柴烧了,岂不省事?可笑,可笑!”^⑥此论正刺中七子及其末流文学拟古主义弊端。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叙》中尖锐地指出:“我明弘治、正德间,李梦阳崛起北地,豪隽辐凑,已振诗声,复揭文轨,而曰:吾《左》吾《史》与《汉》矣!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矣!以予观之,特所谓词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艺之遗,岂不堪淫滌滥,而互相割裂已乎!”^⑦

归有光对当时文坛复古风气抨击最为激烈,《与沈敬甫》云:“仆文何能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⑧归有光尤其批判“后七子”,《项思尧文集序》云:“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

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韩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⑨

3. 共同倡导并实践“本色论”

“本色派”称名关键在于核心成员的文艺观俱倾向于“本色论”,创作亦不同程度地实践了“本色论”。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旗帜鲜明地提出:“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疎卤,然绝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谕,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其捆缚齷齪,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⑩唐顺之《与洪芳洲书》云:“盖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虽若不用别人一字一句,只是别人字句,差处只是别人的差,是处只是别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则炉锤在我,金铁尽镕,虽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文字工拙在心源。……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⑪

由上可知,唐顺之的“本色论”认为,本色是指作家真实天然的人格质地,即作家“自我”,通过为文反映出来,表现为文章中的真知灼见、真情实感。人品决定文品,以文探人。本色高者,其文格调即高;本色卑者,其文格调亦卑;无本色者,其文最劣。若要写出本色文章,作家就应直写胸臆,意出于己,自然表露,不意矫饰。

其他成员的文艺观虽无“本色”字眼,却也是“本色论”的观点。王慎中《与江午坡》提出“其作为文字,法度规矩一不敢背于古,而卒归于自为其

言”^③，这正是意出于己的“本色论”观点，《与项欧东书二》进一步阐述“意出于己所欲言”即是本色文章。此论与唐顺之《与洪芳洲书》所言文章“若皆自胸中流出，则炉锤在我，金铁尽镕，虽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已字句”观点一致。茅坤《复唐荆川司谏书》也表述了与“本色论”相同的观点：“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④这里提倡为文意出于己，彰显作家主体真面目。归有光《答俞质甫书》所云“(为文)出于意之所诚”^⑤，《与沈敬甫》所云“文字又不是无本源，胸中尽有，不待安排”，都符合“本色论”的要义。洪朝选《方山诗录序》云：“然则非言诗之不足以信人，乃其依托假似不出于胸臆肺腑之诚，足以起人之疑而为世之病也。”这里认为诗的表达以显示本色、直见面目为旨归，其他方面即使有所不足也无关紧要。

客观而论，“本色派”主要成员的创作实践逊于其理论倡导，但也在不同程度上践行了“本色论”。王慎中、茅坤的古文成就虽不及唐顺之、归有光，但也有值得称道的本色文章，如王慎中《送程龙峰郡博致仕序》、茅坤《与查近川太常书》等。唐顺之古文名篇《任光禄竹溪记》《与雷古和提学》《答茅鹿门知县二》等，皆自作者胸中而出，见解独具，情感真挚，信手写来，不假雕饰，钱基博评价其“上接欧阳修，下开归有光，在有明中叶，屹然为一大宗”^{[16]706}。归有光在“本色派”中古文成就最高，以疏淡风神之笔描写家常琐屑，悼亡念存，情感真挚，意境亲真，有不少恻恻动人的著名篇章，如《先妣事略》《归府君墓志铭》《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钱基博谓“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开韩、柳、欧、苏未辟之境者也”^{[16]708-709}。尽管他们的古文风格不尽相同，但在表现作者“本色”这一点上具有共性。

4. 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本色派”核心成员俱浸润阳明心学，这正是“本色论”的思想根源。阳明心学的核心论题是“心即理”“致良知”，王阳明认为“吾心”是主宰一切的本源，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人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与认识皆来自“心”。天地间诸事万物，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等，无一不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神圣本然地“天理流行”。阳明心学强调主体的主观自觉性与能动性。唐顺之与王门弟子王畿、罗洪先、聂豹、邹守益等过从尤密，从而接受王门心学思想。唐顺之提出的文学理论“本色论”主张为文意出于己，强调创作主体的独立自觉精神，正

是阳明心学思想在文艺领域的体现。明李开先撰《遵岩王参政传》云：“(王慎中)益得肆力问学，与龙溪王畿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⑥王慎中时任南京礼部员外郎，王畿任南京兵部主事，王慎中得以从王畿处接触阳明心学。《遵岩王参政传》载，嘉靖十五年(1536年)王慎中任江西参议，“其地乃阳明政教所及之地，故老犹能道其详。……更与双江聂司马、东廓邹司成、念庵罗殿撰、南野欧阳大宗伯交游讲学”。这些人都是王门大家，王慎中与他们交游讲学，由此更深入地浸润阳明心学。明代中期王学思潮兴盛，茅坤、洪朝选等人俱程度不同地受到阳明心学的熏染。这便是“本色派”主要成员持“本色论”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本色派”主要成员的又一共性。

“本色派”的成员构成中，王慎中、唐顺之、茅坤、洪朝选等当为核心成员。至于归有光，他与“本色派”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密切。归有光与“本色派”核心成员似无交往，目前仅见唐顺之写与归有光的一封信——《与归熙甫》^⑦，此外再未见他们交往的文字资料。他们是同时代人，归有光的家乡是江苏昆山，与茅坤家乡浙江归安不算太远，何况他与王慎中具有共同的交游对象魏校，又同为文人士大夫，按常理推断，他们应该有交往。然而，笔者视野所及，尚未发现他们交往的确凿的文字资料。但是归有光却有两点与“本色派”核心成员一致，一是反对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文学思潮，二是标举“本色论”的文艺观。这可能是不谋而合，文学倾向趋同的原因在于时代使然。当然彼此之间没有交往也不等于没有相互影响，文坛时代风尚应是相互影响的媒介。就以上所述来看，归有光算不算“本色派”的成员呢？笔者认为，相对于核心成员而言，归有光应算作“本色派”的外缘成员。

从以上考论可以看出，王慎中、唐顺之、茅坤、洪朝选、归有光等组成的作家群体基本符合一个作家流派的特征，尤其在倡导“本色论”这一点上最为接近，由他们构成的文学流派称为“本色派”比称为“唐宋派”更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注释

①“晋江”以籍贯指代王慎中，“毗陵”以籍贯指代唐顺之。②“王参政”指王慎中，“唐太史”指唐顺之。参见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③[明]王世懋：《王奉常集》文部卷五，明万历刻本。④艾千子：《天佣子集》卷五，清康熙刻本。⑤[清]储大文：《存研楼文集》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⑥[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八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⑦[清]

陈廷敬:《午亭文编》卷四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⑧〔清〕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十一,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重刻本。⑨〔清〕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四,清康熙本。⑩〔明〕姚士观:《明太祖文集》卷三《华盖殿大学士刘仲质诰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⑪〔明〕黄佐:《翰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⑫〔明〕宋濂:《文宪集》卷七《文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⑬〔明〕宋濂:《文宪集》卷七《苏平仲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⑭〔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⑮〔明〕朱右:《白云稿》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⑯〔明〕贝琼:《清江文集》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⑰〔明〕杨荣:《文敏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⑱〔明〕姚夔:《姚文敏公遗稿》,明弘治刻本。⑲〔明〕解缙:《文毅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⑳〔明〕王慎中:《遵岩集》卷二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㉑㉒㉓〔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㉔㉕〔明〕唐顺之:《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七《答茅鹿门知县二》,明万历年(1573年)纯白斋刻本。㉖〔明〕唐顺之:《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五《答王南江提学》。㉗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一“十四年乙未二十九岁”,1939年铅印本。㉘〔明〕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三山丽泽录》,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萧良翰刻本。㉙〔明〕王慎中:《遵岩集》卷二十《存悼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㉚〔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六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㉛㉜㉝〔明〕唐顺之:《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七。㉞〔明〕王慎中:《遵岩集》卷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㉟㊱〔明〕王慎中:《遵岩集》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㊲〔明〕唐顺之:《唐荆川先生文集》卷六。㊳㊴〔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㊵〔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本。㊶〔明〕茅坤:《白华楼藏稿》卷一,明万历间递刻本。㊷〔明〕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十,明嘉靖至隆庆刻

本。㊸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明唐顺之楷书真迹。

参考文献

- [1] 李攀龙. 沧溟先生集[M]. 包敬弟, 标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394.
- [2] 张廷玉, 等撰.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7368.
- [3] 郭国平, 王镇远. 清代文学批评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145.
- [4] 钱伯城. 袁宏道集校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695-696.
- [5] 蔡景康. 明代文论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392.
- [6] 黄宗羲. 南雷文定[M]//续修四库全书; 第1397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468.
- [7] 归有光. 震川先生全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1.
- [8] 陈建华. 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六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2: 247.
- [9] 章培恒, 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247.
- [10] 廖可斌. 唐宋派与阳明心学[J]. 文学遗产, 1996(3): 78.
- [11] 黄毅. 归有光是唐宋派作家吗? [J]. 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7(1): 10.
- [12] 张梦新. 茅坤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13] 贝京. 归有光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14] 何天杰. 归有光非唐宋派考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3): 68-73.
- [15] 游国恩.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145.
- [16] 钱基博. 中国文学史[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8.

Checking out that the “Tang-song School” Should Be Called the “Natural Color School”

Zhang Huiqiong

Abstract: The “Tang-song school” was a famous school of writers in the Ming Dynasty, with Wang Shenzhong, Tang Shunzhi, Mao Kun and Gui Youguang as the main members. Since Guo Shaoyu put forward this view in 1947, there has been controversy in academic circles. Based on the textu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really existed a literary school with Wang, Tang, Mao and Gui as its core members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the name of “the Tang-song school” was not appropriate.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irstly, it was a common phenomenon to praise tang-song prose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s of Ming Dynasty, and “Wang, Tang, Mao, Gui” were only among the many writers. Secondly, “Wang, Tang, Mao, Gui” not only worshiped the prose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ut also praised the prose of other times that conformed to their aesthetic standards. Thirdly, “Wang, Tang, Mao, Gui” promoting the standard of prose was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times, but was determined in line with their advocacy of the “natural color”.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Wang, Tang, Mao, Gui”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literary thought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y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echoed each other against “Former seven” literary archaicism, and advocated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view of the theory of nature. Therefore, it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fact of literary history to call them the “natural color school”.

Key words: the Tang-song school; controversy; checking out; the natural color school

责任编辑: 采薇